



在蔣牢中

余心清 著

文史資料出版社

文 史 资 料 丛 书

在 蒋 牢 中

余 心 清

文 史 資 料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北 京

责任编辑： 张文惠

文史资料丛书
在 蒋 牢 中
余心清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1年11月第一版 • 198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7¹¹/₁₆ 字数172,000

印数：1—87,600册 定价：0.87元

统一书号：11224 • 67



作者晚年像



作者青年时代像

出版说明

一九四七年九月，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共谍”案，主犯之一即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中将。

余心清（1898—1966），是一位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战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工作，后因策动国民党将领孙连仲起义，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在蒋牢中》真实感人地记述了他被捕前的政治活动以及被捕后在北平、南京两地的狱中生活，书中多处提到他与冯玉祥将军共同策划反对蒋介石独裁打内战的密切交往。作者从青年时起与冯将军多年相随，他们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互有影响。他们之间不完全是长官与部属关系，同时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所述更是翔实真切。全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的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泛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戮力同心、并肩战斗得来的。

本书解放初期曾在香港有少量印本。此次本社重新出版，特将刘澜涛、平杰三、张执一同志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的文章《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收入作为本书的代序，以便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概况。作者的女儿余华心也写了纪念文章附于书后，她并在文字、标点上作了校正工作，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及历史事件加了详细注释，在此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代序）

.....刘澜涛 平杰三 张执一	(1)
一、由山城到古城	(12)
民权路的会议	(12)
一封电报	(18)
一个警号	(24)
北平的一年	(27)
二、被捕的清晨	(33)
命运的安排	(33)
事件爆发的前夜	(33)
急骤的敲门声	(40)
就这样被牵走了	(44)
三、最初的两个月	(49)
狱中第一课	(49)
在敌人面前	(53)
火的洗礼	(68)
苦难的伙伴	(76)
四、宁海路十九号	(85)
隆重的起解	(85)
人间阿鼻地狱	(90)

可耻的欺骗	(99)
相依为命的日子	(104)
五、羊皮大学	(108)
圣诞老人的礼物	(108)
木笼大厦	(112)
七堂会审	(125)
宣判的日子	(137)
六、不朽的死	(145)
把革命带到牢里	(145)
野狗一样的混帐东西	(150)
五位英雄	(154)
永远的追忆	(162)
七、特刑庭	(166)
热烈地握手	(166)
生命的洪流	(173)
感念与愤怒	(186)
天快亮了	(196)
八、从牢门的狭缝中挤出来	(205)
最后的会合	(205)
又是一套戏法	(213)
树倒猢猻散	(218)
我终于微笑了	(225)
英灵不泯 浩气长存	
——献给我的爸爸余心清	余华心 (233)

我党的挚友余心清同志

(代序)

刘澜涛 平杰三 张执一

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许多党外朋友和我党同甘苦，共患难，同心协力，始终不渝，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历经考验的老朋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有的身陷囹圄，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惨遭折磨，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永远尊敬和怀念他们。

在我们怀念的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和朋友中间，就包括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余心清同志在内。

惊世骇俗的“红色牧师”

余心清，安徽人，一八九八年生于合肥，长于南京。自幼家道贫寒，小学未读完便中途辍学，以种菜、代书糊口。他十七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

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战祸连绵，民不聊生。

余心清不甘心于做一个传播基督“福音”的神职人员，却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九二二年夏，被称为“基督将军”的河南省督军冯玉祥将军，邀请余心清到他的军队中担任“随军牧师”。但这个“牧师”与众不同，每次在军内外布道，从不讲“上帝”、“天国”，却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之根源，以及革命军人应肩负的救国救民的重任，从而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一次，泰安德贞中学请他去讲道，他讲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强邻环伺之下，就要沦为亡国奴的危险处境，指出中国必须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才能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事后，校方认为这次讲话煽动性很大，影射攻击政府，不许学生在底下谈论。从此，“红色牧师”之名，风传一时。

热心育才的教育家

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将军驻军北京，在南苑的团河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余心清被任为校长。该校设有从小学到高中班，免费教育出身寒苦的西北军官佐子弟。由于严格训练，教育有方，培养出不少人材。在他的影响下，冯玉祥将军还积极支持办起了妇女学校。当时西北军军官家属和女孩多系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除了学文化外，还学缝纫、机绣、毛线编结和医护知识等。一遇战事，家属就到前方护理伤病员，进一步密切了官兵关系。

此后，余心清一度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任冯玉祥将军开办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学员均系县长以下的地方行政官员，为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辖区各省训练出一批行政管

理人员。

后来，余心清又调任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校长。他亲手制定的校训是：苦读、苦练、苦做。他经常教育学生说：“目前国家是什么情况呢？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民贼压榨，四万万同胞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边缘。你们必须苦学本领，苦练身体，苦干革命，准备随时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担。”他把学生当作士兵来训练，每天出早操，半夜里紧急集合。并设有适应战争需要的体育锻炼器械，如走天桥、爬吊绳等，为抗日作准备。

余心清在冯玉祥将军军中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常常到课堂听老师讲课，查晚自习，查铺，抽查学生食堂账目，关心学生伙食和健康，深得学生们的拥护。从这些学校毕业出来的学员，不少是西北军的骨干，在抗日战争中流汗流血；有的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解放军的将领，如彭雪枫将军，就曾是团河军官子弟学校的学生。

坚持抗战的爱国者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可耻政策，以致东三省三千万同胞，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此时冯玉祥将军正息影泰山，激于民族义愤，以在野之身，起而号召抗日，派员四出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余心清多方奔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联络桂系、粤系以及四川的反蒋军事力量，策划共同抗日。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开始侵入华北地区，北方风云紧急。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将军在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举起了抗日义旗，冯玉祥将军自任总司令，吉鸿昌、方振武等是主战最力的将领，余心清任总务处长，并兼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他竭尽全力，保证前方的军需供应，做好后方的安定工作，为抗日同盟军的对日作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七月十二日，抗日同盟军经过浴血苦战，收复了多伦等四县，光复了察哈尔全部失地，振奋了全国人心。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加冯玉祥将军以“破坏国策”的罪名，调十三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军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挑拨离间、重金收买等鬼蜮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在此险恶形势下，冯玉祥将军被迫去职，抗日同盟军功败垂成。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到剿共前线，阴谋借刀消灭异己。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为达到联共反蒋抗日的目的，在福建发动了“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改元易帜，与蒋介石的南京卖国政府公开决裂。这个时期，余心清作为冯玉祥将军的全权代表，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了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余心清是由十七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在会上发表反蒋抗日救国的讲话。大会通过了宣言，公推李济深、冯玉祥、蔡廷锴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派张云逸同志代表参加。

根据实际情况，在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设三会、两部、一

院、一局。其中经济委员会由冯玉祥兼任主席，由余心清代理。余心清当时提倡冯玉祥式的艰苦作风，开展厉行节约的运动，由李济深带头，凡属政府人员一律穿中山服，戴工人帽，一时蔚然成风。

但是，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即决心以武力来消灭它，抽调二、三十万大军入闽，同时从空中猛烈轰炸。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孤军奋战，加以党内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也没有予以很好的配合，历时三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中旬便失败了。余心清受到蒋介石的明令通缉，流亡到日本去避难。

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

一九三五年夏，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余心清不顾被蒋政府逮捕的危险，潜回国内，继续从事反蒋活动。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余心清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领导下，肩负起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统战工作的任务。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是冯玉祥将军旧部，余心清利用西北军过去的关系进行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未承认我党为“合法”政党，红军也尚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党为了发动山东地区的抗战，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特委派张经武、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为我党代表，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韩复榘合作，借其公开合法地位，帮助该集团军建立政治工作，办起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余心清出任政训处中将处长兼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党动员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平津流亡学生千

余人考入这个训练班。余心清聘请了原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我党党员和左派教授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许德珩等为教官，讲授国际形势、中日问题、游击战术、动员民众等课程。学员结业后，分配到临清、德州、烟台、聊城等各地，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在山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我党政军中的不少高级干部，是当时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一九三九年，余心清到重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廉洁奉公，不辞辛劳，大力开展救济难民和收容孤儿的工作，曾到过华北，并到了解放区。他亲眼看到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内心极为倾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面目日益暴露。一九四四年，余心清参加了接受我党领导的国民党内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余心清与徐冰同志直接联系，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余心清决定北上之前，曾向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面请示行止，他们希望他尽可能把北方一些“杂牌”军争取过来，孤立蒋介石，策应解放大军。

同年十月，他应冯玉祥将军的旧部、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之邀，到北平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以北平为基地，积极展开民主活动和争取孙连仲起义的工作。在他的住处，曾经开过不少次秘密会议，也举行过多种形式的座谈会。他邀请许多知名的大学教授，一道讨论国际形势。一些革命同志，在他这里暂住避难。徐冰同志常常约人到这里会晤，布置工作。余心清同许多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也在这里接头。在

蒋介石特务密布的白色恐怖下，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革命只有一条路，“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他曾叮嘱他的妻子刘兰华：“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一有那一天，我把母亲和孩子都托付给你了，千万把孩子培养成人，继承我没有做完的事业。”

一九四七年，被迫流亡美国的冯玉祥将军，发表了轰动中外的《告全国同胞书》，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反对美国援蒋打内战，支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青年学生。冯在国内的一些旧部，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或为保全个人的禄位，纷纷去信劝他勿发反蒋政府言论，有的还对冯进行人身攻击。唯有余心清却满腔热情地去信说：“故国情势，已临最后关头，不治之症，待其死灭。……腐枝不去，新干不生，黑夜深时天破晓。自先生之言论，隔洋传来，使青年朋友兴起，使舆论激动，使腐败当道震栗，使老百姓寄以最大希望，此所谓‘一言九鼎’，‘一鸣惊人’，而国际人士，更引起重视。”

一九四七年中，由于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在余心清的耐心争取下，孙连仲开始动摇，表示愿与我方进行洽谈。余心清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当即就此事对我北平地下党同志作了指示，并指出这是华北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行动。不幸，党的秘密电台被敌人侦破，中央领导同志的电文记录稿及其他一些电稿未及销毁，导致了余心清和我党一大批优秀同志被捕，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余心清在被捕前，还通知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迅速转移。在狱中，余心清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供词就是讨蒋的檄文。他写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

将死，其言也善。全国的人，都不愿打内战。国家的人力、财力，也不许打内战。穷兵黩武，后患堪虞！见仁见智，非我所顾。年已半百，死当其时。”他一度与几位共产党员同囚一室，他从他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余心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遗嘱：“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黑暗的尽头，也就是光明的开始。当蒋家王朝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上台，经我党大力营救，余心清获释出狱。党即派人掩护他到上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勇于负责的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余心清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地投入了建国后的繁重工作。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一、二、三、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在政权机关、外事活动、民族事务、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余心清于开国之初任典礼局局长时，与外交部有关同志一起，参照各国礼仪，为我国制订了最初的外交礼仪规定，并把各省、市交际处负责人调来北京学习。在他任典礼局长任内，没有

设其他副职，事无巨细都要他亲自过问，事事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记得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上讲：“现在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政务院系统的事务工作，头绪纷繁，任务琐细，他一再教育工作人员要认识这一工作的政治意义，不能有丝毫马虎。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员，有一次由他负责安排选举事务，他事先召集工作人员，就发票、投票、检票、计数以及代表从座席到票箱投票的最短路线等各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细致的布置，圆满地完成了庄严的选举任务。余心清同志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严格的，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粗心大意。

不可侮辱的志士

余心清是我党的真朋友、好同志。然而令人愤懑不平的是，他没有死在蒋介石的铁牢之中，却死在十年内乱的暴政之下。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余心清同志不能忍受对他的那种人身侮辱，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封建法西斯淫威，悲壮地倒下了。

余心清辞世前，致书周恩来同志，以他一向为人的坦率，对当时那种假群众运动之名，践踏法制，“横扫一切”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他恳切表示，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虽然曲折，但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贯的。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丧失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信赖和感念之情。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后，齐燕铭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便抓了对余心清同志的平反昭雪工作。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余心清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